

# 中国古代的车马坑陪葬

□ 刘允东

车马坑是古代墓葬的一种陪葬坑,依据坑内埋葬内容不同,又可以区分为车葬坑、马葬坑和车马合葬坑三种类型<sup>[1]</sup>,本文讨论的车马坑主要是指车马合葬坑。车马坑随葬的丧葬习俗,始自商代晚期,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初期许多诸侯王墓仍然设置车马坑。用车马坑随葬是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车马坑见证了中国古代礼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但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实践情况各不相同。本文试图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并结合文献记载,按时代顺序,将中国古代的车马坑随葬制度进行分析探讨,求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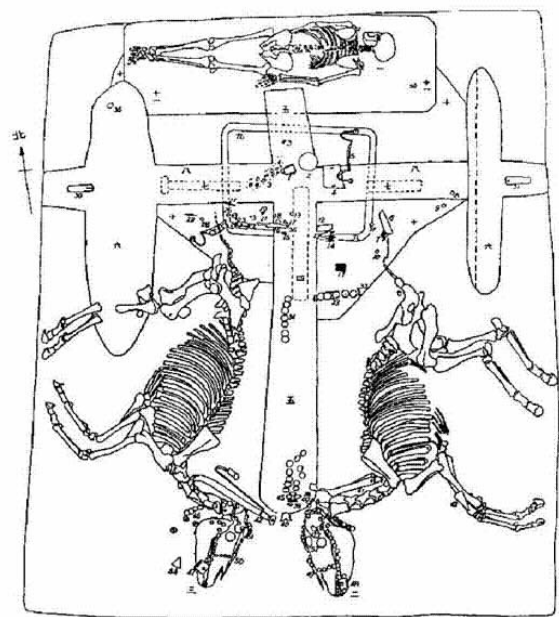
## 一、商代的车马坑陪葬

商代的车马坑遗迹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大、西安老牛坡三地,其中以殷墟出土的最多<sup>[2]</sup>。

到目前为止,殷墟发掘的车马坑的数量近五十座,分别分布在小屯东北地、西北冈王陵区、大司空村、孝民屯、白家坟、郭家庄、刘家庄北地、梅园庄东南等地。殷墟发掘的车马坑一般随葬在大中型墓葬周围,或成组排列,或单独一座,坑内一般埋有1车2马1人。成组的一般是2座一组,个别的5座一组。成组的车马坑的大小、方向、深度、坑内马骨架的头向以及填土内陶片的时代等基本相同。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市郭家庄东南发掘了M160的两座陪葬车马坑M146、M147。两坑相距1米,一南一北排列,两坑的方向均为105°,坑口深度、形状、坑底结构基本相同,两坑内出土物也表明时代均属于殷墟三期偏晚阶段<sup>[3]</sup>。另外,在殷墟还发现少量与大墓同穴埋葬的车马坑。1977年春,殷墟西区第三墓区的M698的南墓道内,清理了1座车马坑,内埋1辆车、2匹马、1人<sup>[4]</sup>。无论是与主墓同穴埋葬的车马坑,还是异穴埋葬的车马坑,都

是先挖好坑,将处死的人和马放入坑中,然后再放车或车的部件,有的坑内掘有马坑和轮槽。马匹身上一般都裹有席类葬具,常见的葬式有背相对、背相向、腹相对、蜷伏4种,在具体埋葬方式上有三种形式:(1)基本上按照原来马车的使用的情况埋葬,即驾马与车子套在一起,马做驾乘状(图一)。大部分的车马坑都是这种形式。(2)拆车葬,车马脱套,将马车的主要部件如轴、轮、舆、衡拆开,分别埋入坑中。这种埋葬方式比较少。(3)整车与拆散的车子共葬于一坑,这种形式目前只见一例<sup>[5]</sup>。

殷代的车马坑随葬表呈现出鲜明的等级性。考古发掘表明,车马坑主要陪葬在甲字形、中字形或亚字形大墓附近,而这些大墓的主人往往是殷代王公贵族或达官贵人等高级贵族。同时墓葬的规模不同,随葬车马的数量也有差别。殷墟王陵区发掘的墓葬



图一 商代的整车葬

共有四个类型: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带两条墓道的大墓、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和不带墓道的大墓。一般认为墓道的多寡与墓主人的政治地位、身份等级有密切联系。在殷墟早期,带四条墓道大墓仅同穴殉车一辆,两条墓道的大墓同穴殉车一辆或仅殉马而无车;到殷墟晚期,从随葬车的数量上看,四条墓道同穴殉车二辆,单墓道大墓仅殉车一辆<sup>[9]</sup>。

依商代晚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制作一辆木车非常复杂,“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考工记》),马车的制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许多部门的分工协作,是一门技术难度较高、需要很高工艺水平的手工业技术,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1995年殷墟梅园庄东南M40车马坑,内埋2车,一辆车保存完整,另一辆车则已残破<sup>[7]</sup>。这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制车难度较大,人们对于已经残损又难于修理的车子舍不得扔掉,便将它们保存起来,作为殉葬之物<sup>[8]</sup>。贵族尚且如此,对于一般人而言根本谈不上“乘殷之辂”(《论语·卫灵公》),更不用说死后随葬车马坑了。只有相当地位的贵族才有条件乘车之便,而死后能享受“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圻”(《墨子·节葬下》)的,更是少之又少,或许只有殷王及王室成员或嫡亲执政者,至少也是商朝的高级贵族才有条件享受车马坑的陪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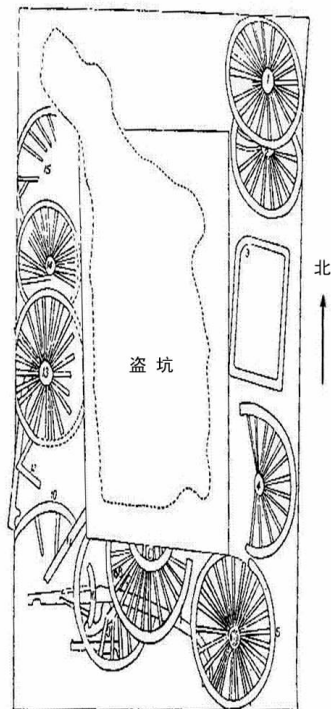
正如上述分析,殷墟时期,随葬车马坑的主墓墓主身份是有等级限定的,只有身份比较高的贵族才有权享受车马随葬的礼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份高贵者一定有车马随葬。在殷墟发掘的许多高规格的墓葬周围,我们并没有发现车马随葬的现象。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其墓周围未发现车马坑,仅在墓内发现铜马镳等种类极少的车马器。这一点仅仅用工作做得不够是解释不通的,最有可能的是,当时的车马殉葬制度刚刚开始,并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在上层统治阶级中间尚未普及。因此,虽然商代的车马殉葬仅限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殷墟以外的区域,属于该时期的车马坑随葬只在山东滕州前掌大、西安老牛坡有发现。两地发现的车马坑各仅一座,不见殷墟的成组殉葬的车马坑,车马坑的埋葬方式与车子的形制与殷墟的车马坑一样。这就清楚地表明在晚商时期,在殷墟以外享受车马陪葬的人是有限制的,而且数量极少。因此,殷墟时期的车马随葬现象是先秦车马随葬的萌芽。尽管如此,商代出现的车马坑陪葬为西周乃至东周随葬车马奠定

了基础<sup>[9]</sup>。

## 二、西周时期的车马坑陪葬

西周时期的车马随葬是在殷墟时期车马随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比如车马坑基本上是属于异穴埋葬,车马坑与主墓分开,另挖一坑,整车随马埋葬。在埋葬方式上,商代流行的马作驾乘状、拆车葬等形式,这一时期仍然常见。但是西周时期的车马坑随葬也有自身的特点。

与商代相比,西周时期的车马随葬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车马坑的陪葬现象开始普遍,在西周多处贵族墓地里都发现有车马坑。如浚县辛村、沔西张家坡、山西曲沃、北京琉璃河、宝鸡竹园沟等地的墓地里,都陪葬有车马坑。从分布范围看,车马坑随葬不再仅仅局限于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开始向周围扩散。除陕西外,山东、河南、北京、山西、宁夏、河北、甘肃等地都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车马坑。其次,车马随葬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商代晚期。出现了大型车马坑,坑内随葬车、马的数量是殷墟时期无法比拟的,车马器的随葬数量更是大得惊人。河南浚县辛村3号车马坑中放置有12辆车、72具马骨架<sup>[10]</sup>。再次,车马随葬出现了新的方式。成组殉葬车马坑的形式基本不见,商代比较流行的整车葬到



图二 西周时期的拆车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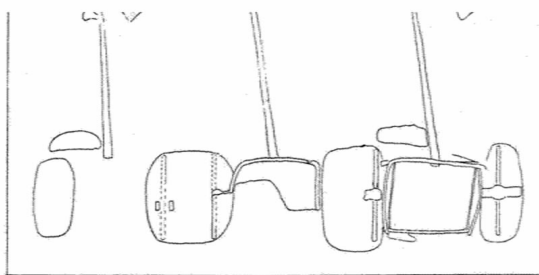
西周中晚期成为个别现象,而拆车随葬、另穴埋马的情况成为主流(图二)。张家坡墓地发掘的三座井叔墓 M157、M152、M170 中随葬的车子都被拆散成轮、舆、辕、轴、衡、轭等部件,分别放在椁盖上、二层台的四周、墓道的底部和两侧。其中 M157 南北两个墓道和椁盖上共发现 30 个车轮、12 个车箱,还有辕、轴、衡、轭等遗迹<sup>[1]</sup>。在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处也发现有类似的情况,这似乎是周族的一个习俗<sup>[2]</sup>。另外,车马随葬的适用范围也扩大了。发掘资料显示,大部分西周贵族墓中或周围都有车马坑随葬——至少是有车马器随葬。在张家坡墓地,有些士一级的墓葬就陪葬有车马坑。

西周时期的车马坑随葬呈现出制度化倾向。具体表现是依墓主人身份的高低而随葬数量不等的车马,且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等级差别明显。通常情况下,墓主身份越高(墓葬规模越大),随葬车马数量、车马器的数量及种类就越多。西周时期的车马随葬除了具有统一性,还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各地的车马坑的设置、车马随葬的流行时段、车马器的选择、车马器的摆放方式皆有所不同。西周早期都是单坑整车随马埋葬,中晚期则在墓内随葬拆散的车,而马在附近另穴埋葬。在王室统治的中心区域,车马随葬与礼制结合比较紧密。张家坡墓地随葬车马坑的墓主是士一级的贵族,文献记载:一般情况下士应随葬 1 辆车,特殊情况下可以用 2 或 3 辆车(《仪礼·既夕礼》,贾公彦疏)。张家坡墓地发掘的 15 座车马坑中最多的随葬 3 车,最少的随葬 1 辆车<sup>[3]</sup>。张家坡西周墓地位于陕西省长安县,从西周初年一直延续到西周末年,其车马随葬情况基本反映出王朝统治中心区域中下层贵族的车马随葬习俗。其他地区的执行情况则没那么严格。按《仪礼·士丧礼》载,侯伯一级的贵族当随车 7 乘。《仪礼·觐礼》郑玄注,诸侯用四至六匹马驾车。晋侯墓地共发掘 9 组 19 座墓葬,每组墓均陪葬一个车马坑,正在发掘的 1 号车马坑墓主为第八代晋侯苏,坑内随葬有马至少 105 匹,车的数量在 40 辆以上,远远超出文献记载的数量。另外一座西周时期大型车马坑——浚县辛村 3 号车马坑出土车 12 辆,与文献记载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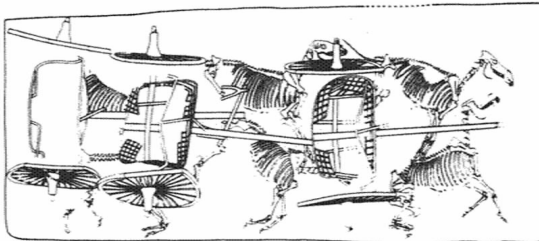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不一致,正是西周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事实上,西周时期各诸侯国的礼制并不一致。《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可见周初各诸侯国的施政方针与礼制并没有完全统一,而这种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许可。至周公制礼作乐,王室王畿当已统一,但并未完全推广到各诸侯国。车马坑随葬的情况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 三、春秋时期的车马坑陪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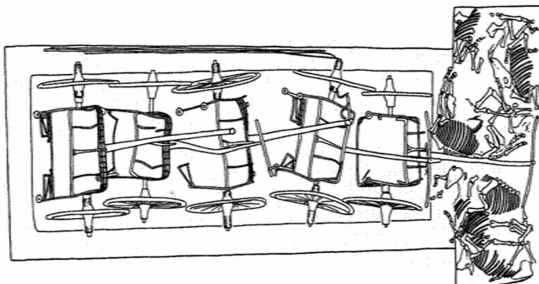
春秋时期,车马随葬发展到一个高峰期。西周时期曾经十分流行的拆车葬此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主墓外单独掘坑陪葬。上村岭虢国墓地、上马墓地、浙川下寺墓地、临猗程村墓地发掘的车马坑全部采用这种方式陪葬。我们推测,这是春秋时期



1.浙川下寺 M8CH 车马坑



2.三门峡机械厂车马坑



3.程村墓地 M1009 号车马坑

图三 春秋时期车马坑的埋葬形式



车马坑设置的一般规律。从考古发现看,春秋时期车马坑随葬有以下三个特点。

1.车马坑的埋葬方式多样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类为车与车左右并列,马分置车辕两侧作驾乘状态;二是车与车前后纵列,马亦分置车辕两侧作驾乘状态;三是车马坑内出现车坑与马坑之分,车马分置,车作前后叠压状,马不作驾乘状态放置。第一类以浙川下寺墓地发现的车马坑为代表。浙川下寺共发掘5座车马陪葬坑,坑内车的排列都一样,车子左右并列横摆在坑内,马呈驾乘状(图三,1)。这种形式是楚国的定俗<sup>[4]</sup>,常见于春秋中晚期。第二类形式以虢国墓地的车马坑为代表。虢国墓地发掘的8座车马坑,最少的埋1车2马,最多的埋19车38马。埋有2辆以上的车时,多辆车排成一纵列,前一辆车的车箱压在后面一辆车的车辕上,每辆车下面都压着驾乘的马匹(图三,2)。这种类型的车马坑一般流行于春秋早期。第三种形式是最多的,程村墓地、上马墓地的车马坑都是这种形式(图三,3)。程村墓地发掘8座车马坑,多车一坑的车子都是东西纵向排列,后车的辕压在前车的舆上。车坑与马坑之间由生土隔梁或二层台隔开,马坑在前放置马匹,车坑在后放置车辆。这种类型的车马坑最早见于春秋早期,中晚期比较流行。

2.车马坑随葬的等级差别依然明显。上村岭虢国墓地的车马埋葬向我们展示了一套严格的车马

随葬制度(表1)。7鼎的1052号墓是虢太子墓,其车马坑为1051号坑,出土了10辆车20匹马。5鼎的1706号墓和1810号墓的车马坑分别为1727和1811号坑,各出土了5辆车10匹马。3鼎的1721号墓的车马坑出土了3辆车6匹马,1鼎墓用1车2马作陪葬<sup>[5]</sup>。临猗程村墓地的车马坑陪葬也基本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表2)。从宏观角度来观察,这时期随葬车马数的变化与用鼎制度的变化是一致的,春秋中、晚期诸侯用鼎数上升到9鼎、卿的用鼎数升至7鼎,同期随葬车马的数量也都超过了春秋早期的诸侯级墓葬<sup>[6]</sup>。这表明,春秋时期墓主身份高低与随葬车马数量有一定之规,车马随葬与礼制的结合较为密切。但是,如果仔细比较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我们发现春秋时期的车马随葬与文献记载的礼制在对应关系方面依然表现出松散的状态,各地随葬车马数量与墓主身份等级的对应程度并不完全一致。即使在上村岭墓地,车马随葬也没有完全遵循上述规律,M2001陪葬7鼎,墓主是一代虢君虢季,其陪葬的车马坑内埋13车64马。另外一座是M2012,5鼎墓,墓主为虢季夫人,其陪葬的车马坑内则葬有19车38马。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春秋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车马随葬在象征等级身份方面表现得相当严格,一方面许多高级贵族都有车马坑随葬的习俗,另一方面贵族内部在随葬车马数量多寡上与墓主等级地位高下关系密切。同时随葬车马的具体数量并没有统一规定,加之该时期各诸侯国自身势力的增强,各地的墓葬习俗具有越来越多的地方特色,同一级别的贵族在随葬车马数量上差别较大的现象出现并日益增多。

3.车马坑随葬的时空差别突出。春秋早期的车马坑延续了西周时期车马坑的形制,为长方形。到了春秋晚期,出现了其他形制的车马坑。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的车马坑平面呈曲尺形<sup>[7]</sup>,临猗程村M0026号、M1009号车马坑平面呈“T”字形<sup>[8]</sup>,长武上孟村车马坑平面呈梯形<sup>[9]</sup>,陕西礼县秦公墓地K1号车马坑平面呈瓦刀形<sup>[9]</sup>。车马数量上,春秋晚期的诸侯级墓无论是随葬的车数还是马数都超过了春秋早期<sup>[21]</sup>。地域不同,车马随葬的习俗也有所差别。楚国的车马坑流行长方形,马作驾乘状,车子左右并排;齐国则出现诸侯级大墓只殉马而无车的现象<sup>[22]</sup>;晋国开始出现曲尺形车马坑<sup>[23]</sup>。关于这一点,下文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的威信已大不如前,但仍

表1 上村岭虢国墓地随葬鼎制与车马对应表

墓号	随葬车马数	用鼎数量
M1052	10车20马	7
M1706	5车10马	5
M1810	5车10马	5
M1721	3车6马	3
1鼎墓	1车2马	1

表2 程村墓地车马坑与所属主墓对应表

坑号	车马数	主墓号	鼎数	车马器
0026	5车18马	0020	3	
		0002	5	曹辖4套、銜14、镳4
0027	2车?马	0003	3	曹辖2套、銜、镳
		0004	1	
1009	5车12马	1001	5	曹辖10、辖9、銜14、镳22
		1002	5	
1058	3车?马	1056	3	曹辖2副
		1057	1	曹辖4副、銜12、镳7
1061	1车2马	1062	1	曹辖2副、銜2、镳4
		1120	1	銜镳3
1063	1车2马	1064	1	曹辖2副、銜2、镳3
		1119	1	

是天下共主,诸侯行事依然打周天子的旗号,正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墓葬习俗中,各地的车马随葬依然表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具有统一性的一面。同时,诸侯国实力的增强,特别是自主权的增强,各地出现了适应当地风俗习惯的车马随葬方式,具有个性化的一面。

#### 四、战国时期的车马坑陪葬

战国时期车马殉葬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以真车马殉葬的情况越来越少,用车马模型殉葬的现象占据主流,显示出真车马随葬的动摇,车马随葬的等级色彩也逐渐减淡。这既是西周传统礼制崩溃的反映,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

许多大型墓没有设置车马坑,即使有车马坑陪葬,其数量也远远逊色于春秋时期同等规模的墓葬。山彪镇1号大墓随葬有7鼎,没有车马坑陪葬<sup>[24]</sup>,春秋晚期的金胜村赵卿墓同样随葬7鼎,但随葬车马的情况却有天壤之别<sup>[25]</sup>。有车马坑陪葬的墓葬如中山王1号墓,墓主为诸侯级,两个车马坑内所出车总数不过10辆<sup>[26]</sup>。可见当时的车马随葬在象征墓主身份方面已日见衰退。战国时期的车马坑继承了春秋中期前后车坑、马坑相对隔开的特点,车坑与马坑之间或以生土隔梁隔开或以木板隔开。这类车马坑有特殊的含义,象征着死者的车马厩,显示着墓主生前所拥有的财富<sup>[27]</sup>。淄河店二号战国墓是一座“甲”字形墓,墓内发现了20余辆独辕车,墓室北侧13米处的殉马坑内清理出马骨架69具<sup>[28]</sup>,数量上远远多于墓主身份为诸侯王的中山王墓。墓主为大夫级的枣阳九连墩一号车马坑内随葬33辆车72匹马<sup>[29]</sup>,数量也多于中山王墓。这就说明当时的车马随葬已失去了严格的等级性,僭越现象比较普遍,更多的是用来炫耀死者生前的财富。

与随葬真车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模型车马甚至明器车马开始盛行。陕西长武上孟村的战国初期墓M26随葬有陶车泥马模型<sup>[30]</sup>,洛阳西工区战国初期墓随葬有铜车马模型<sup>[31]</sup>,湖南湘乡牛形山一号战国中期墓随葬有木马模型<sup>[32]</sup>,河南淮阳马鞍冢楚王墓以真车23辆、泥马20多具殉葬<sup>[33]</sup>,秦始皇陵随葬的铜车马更是模型车马随葬的集中表现<sup>[34]</sup>。

战国时期车马随葬变化的另一趋势是地域性特点更加明显。秦国出现了梯形车马坑和同穴随葬的车马坑。春秋时期秦国就出现了这种形制的车马坑,战国时期,梯形车马坑在秦国依然是一种重要

的车马埋葬形式。而同穴埋葬车马坑的形式在商代比较常见,西周以后基本不见。该时期,在秦国发现了这种十分古老的车马埋葬形式。1974年甘肃省平凉县两座战国墓,两墓墓室呈“凸”字形,凸出部分专门埋葬车马<sup>[35]</sup>。赵国出现了曲尺形的车马坑,1957~1959年邯郸百家村发掘的两座战国时期的车马坑皆为曲尺形<sup>[36]</sup>。这种形制的车马坑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晋国,赵国的曲尺形车马坑显然是对晋国车马随葬传统的继承。齐国还出现了在墓室内葬车、墓外埋马的现象<sup>[37]</sup>。

楚国的车马埋葬自春秋时期就独具特色,战国时期仍然延续下来。楚国的车马坑与主墓呈纵向横列排列,即主墓为纵向,车马坑为横向<sup>[38]</sup>。车马坑的形制也与其他诸侯国略有不同,平面形状基本上呈长方形,但是往往在长方形坑的长边一侧开有1~3条斜坡通道。枣阳九连墩一号车马坑,坑西壁开有三条斜坡坑道;二号车马坑西壁开有一条斜坡坑道<sup>[39]</sup>。淮阳马鞍冢两座车马坑的长边也有斜坡坑道<sup>[40]</sup>。坑内车马的摆放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随葬2辆以上车的,车作横向并列摆放,车辕两侧或驾2马或驾4马,马作驾乘状。湖北宜城罗岗M1车马坑、湖北枝江姚家港M2车马坑、江陵九店M104车马坑及淮阳马鞍冢1号、2号车马坑皆采用这种方式<sup>[41]</sup>,这种车马随葬形式是楚国的埋葬习俗<sup>[42]</sup>。

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贵族阶层日益末落,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兴起并逐渐掌握国家政权。本来就处于松散状态的车马随葬此时更是严重混乱,许多贵族不再把车马随葬当成是彰显身份地位的必需品。战国时期车马埋葬的鲜明地方特色,是诸侯争霸、百家争鸣、价值多元化的具体体现。

#### 五、秦汉时期的车马坑陪葬

秦汉时期车马殉葬应用的地域范围不广、范例不多,车马殉葬已显示出种种简化、没落的趋势,但从其应用的场面和殉葬质量等情况看,殉葬车马仍不失为是当时一种超豪华的殉葬规格或礼仪。从秦始皇到汉代的诸侯王,都把殉葬车马列入殉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或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秦汉时期的车马随葬,其等级身份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实际应用的场合中等级层次的要求比春秋战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到目前为止,已发掘的西汉诸侯王(或王后)墓近40座,其中17座发

现有真车马随葬的现象。一般随葬车 3 辆,马 11~16 匹。在全国范围内如此统一,说明这可能是当时诸侯王墓的一种制度<sup>[43]</sup>。

汉代的厚葬之风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统治者也认识到了危害,于是永始四年成帝下诏禁止埋藏过制,“方今世俗奢僭罔极,……车服嫁娶埋藏过制,……而欲望百姓俭节,……其申敕有司,以渐禁止。”《汉书·成帝纪》载:“六月己未,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因此到了西汉后期,极少有诸侯王墓随葬真车马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这一时期的诸侯王墓殉葬车马。至此,真车马殉葬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用明器车马来随葬的做法却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

[1][6][9] 郑若葵《试论商代的车马葬》,《考古》1987 年第 5 期。

[2][5][8] 刘一曼《殷墟车子遗迹及甲骨金文中的车字》,《中原文物》2000 年第 2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 年—1992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 年—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 1 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 年第 10 期。

[10] 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 年。

[11] 张长寿、张孝光《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 年第 2 期。

[12][27] 李自智《殷商两周的车马殉葬》,《周文化论集》,三秦出版社,1993 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年。

[14][38][42] 黄文新《试析楚国车马坑——兼论淅川下寺 M2 车马坑的归属问题》,《发掘荆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年。

[15] 胡小龙《浅谈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华夏考古》1993 年第 4 期。

[16][21] 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

[17][23][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临猗县博物馆《临猗程村墓地》,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年。

[19][30] 袁安志《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 年 3 期。

[20]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相关问题》,《文物》2000 年 5 期。

[22] 张学海、罗勋章《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文物》1984 年第 9 期。

[24]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 年。

[2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1 期。

[28][3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考古》2000 年 10 期。

[29][3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楚墓》,《考古》2003 年 7 期。

[31] 洛阳市博物馆《洛阳西工区战国初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

[32]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乡牛形山一、二号大型木椁墓》,《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

[33][4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 10 期。

[34]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 年。

[3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 年 4 期。

[36]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 年 12 期。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宜城罗岗车马坑》,《文物》1993 年 12 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江陵县九店东周墓发掘纪要》,《考古》1995 年 7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 10 期。

[43] 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 年第 2 期;郑澐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考古》2002 年第 1 期。

(作者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讲师)